

论 17、18 世纪德意志地区的宫廷犹太人

张礼刚

内容提要 在 17、18 世纪,由于欧洲及德意志地区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犹太人特殊的历史经历以及对居住地表现出来的“忠诚”和“弱民”地位等原因,在德意志地区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犹太人群体——宫廷犹太人。他们利用其经济方面的影响,积极参与在宫廷的军事斗争、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受到宫廷的信任,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虽然他们与犹太社团有着一些冲突,但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在管理犹太社团事务、形成新的犹太社团、传承犹太文化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这个时期宫廷犹太人的活动为犹太启蒙运动和犹太人的解放准备了条件。

关键词 德意志地区 宫廷犹太人 犹太社团

在漫长的散居生活中,犹太民族作为一个弱小的群体,在大部分时间里遭到主流社会的歧视、驱逐、迫害,甚至残暴的屠杀,纳粹屠犹走到了极端。当走出犹太人遭受的苦难阴影之外,我们会发现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由于主流社会对个体犹太人的态度不同,在一些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有一部分犹太人走进主流社会生活,过着与其他犹太人不同的生活,成为犹太历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独特的浪花,宫廷犹太人就是这些美丽浪花中的一朵。所谓的宫廷犹太人主要是指那些与宫廷保持着微妙关系,享有很大特权的一部分犹太人。虽然我们不知道宫廷犹太人准确的出现时间,但资料显示宫廷犹太人最早出现于穆斯林世界。因为当穆斯林军队进攻西班牙的时候,犹太人把他们作为粉碎基督教残酷统治的解放者来欢迎,再加上新占领的地区也需要犹太人为他们服务,所以犹太人在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受到了当权者的信任,有些西班牙的犹太人就抓住这个机会与阿拉伯的宫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 10 - 13 世纪,一些犹太人获得了宫廷银行家、宫廷御医等头衔,享有较大的权利,当西班牙当局对犹太人政策逐渐恶化时,这些宫廷犹太人纷纷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形势的发展,17、18 世纪在德意志地区涌现出许多宫廷犹太人,他们十分引人注目,如布拉格的雅各·巴塞维,他是地中海地区第一位越居贵族阶层的犹太人;维也纳的萨姆森·威特海默,他是维也纳、美因茨、帕拉第内特

《犹太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Judaica)第 3 卷,耶路撒冷 1971 年版,第 1006 页。

徐新:《犹太文化史》,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 2004 年印,第 39 页。

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81 - 183 页。

和特雷福斯法庭的总代理,在西班牙各衍生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负责奥地利的军粮供应;撒母耳·奥本海默是前者的同僚,曾经帮助他的侄子大卫·奥本海默在牛津建立了被誉为是希伯来书籍收藏中心的“博雷安”的图书馆;约瑟·苏斯·奥本海默被后人亲切地称为“犹太人苏斯”,在悲剧性的倒台之前,他在威尔茨堡的宫廷中曾是一位无所不能的人物。这个时期德意志地区几乎每个侯国都拥有宫廷犹太人,他们在国王或领主的保护下,可以不受中世纪针对犹太人的禁令限制,出入宫廷,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无论对主流社会的宫廷还是对犹太社会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影响,研究这一特殊群体对我们全面认识和理解近代犹太历史及其犹太人解放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虽然国外有一些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国内还没有学者论及这个问题。本文根据现有的材料试对 17、18 世纪德意志地区的宫廷犹太人加以初步探讨。

一、德意志地区较多出现宫廷犹太人的原因

在反犹主义比较盛行的欧洲,为什么德意志地区会出现这么多的宫廷犹太人?应该说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第一,欧洲及德意志地区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为宫廷犹太人大量出现提供了契机。中世纪君主专制统治在欧洲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庄园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到了近代早期这种情况逐步发生了变化。这个时期英国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中产阶级,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税收体系和地方官僚机构,国家基本上能够按照国王的目的进行运作。在安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地方的银行家和商人乐意把资金借贷给政府。在法国,国王基本能够控制住整个王国,农业税的收入能够满足王室的挥霍。所以在这两个国家当中,犹太商人和金融家没有很大的市场,在政治经济生活中也没有重大的影响。与英法相比,德意志地区情况就大不一样。在 16 世纪德意志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位置比较重要,经济还算繁荣,哈布斯堡皇帝和地方的君主能够从德国的银行家和商人手中借到大量的资金。自 17 世纪以来,该地区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德意志成为欧洲的主要战场,接二连三发生战争,特别是三十年战争(1618 - 1648 年)使德国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人口与牲畜剧减,一度执北欧商业之牛耳的汉撒同盟也被占据海上霸权的英国和荷兰的公司取代,德国最享盛名的银行家富格家族,也在此期间因战争和西班牙王室赖债(1607 年)而破产,这无疑断了德国皇帝和地方君主借债的主要渠道。再加上物价的起伏,统治者需要奢侈增多,德意志境内的一些君主有时需要举债度日,不论哈布斯堡的皇帝,还是其他地方的一些公国的君主都负债累累。因此,这些专制君主需要寻找新的财源。

同时,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削弱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加深了德意志境内分裂割据的局面。这场战争使德意志损失了 1/3 的人口,300 多座城市,2000 多个村庄毁于一旦。封建主利用战争造成的破坏,大肆霸占土地,许多自由农变成了农奴,13 世纪已被废止的农奴制得以复活。在易北河东岸地区,自由农就“像白色的乌鸦一样罕见”,当时德意志境内出现了大大小小的 360 多个独立邦国,4 万个世俗领地和 4 万个教会领地。政治的分裂导致了关税壁垒,严重地影响了经济

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第 390 页。

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第 389 页。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37 页。

F. L. 卡斯腾:《宫廷犹太人:解放的先驱》(F. L. Carsten, *The Court Jews: A Prelude to Emancipation*),利奥拜克研究所 1958 年版。

的发展。此时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几个大的邦国面对荷兰、英国等国家的强大,希望建立他们的国家和军队,像在凡尔赛宫的太阳王一样拥有无限的权力。然而,德意志境内的公国和地方贵族为了自己的利益,千方百计地阻止中央集权和皇帝取得绝对权力。各个邦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都在积极寻求忠于自己的统治工具。

第二,犹太人特殊的历史经历造就了犹太人为宫廷服务的职业条件。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德意志犹太人从事的职业与基督徒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一般而言,人们喜欢选择那些工作轻松、地位高和利益丰厚的行业。然而,犹太人受到基督教会和世俗势力的歧视和迫害,许多职业他们不能涉足,只能从事一些所谓的低贱的职业。在农业方面,由于欧洲各国禁止犹太人占有土地,如“西哥特人的法律使全部犹太人丧失了他们的家产”,使得犹太人不可能拥有土地;欧洲还接连不断地发生驱逐犹太人等反犹事件,犹太人有随时迁徙的可能,具有很大的流动性,犹太人也不宜从事农业和拥有大量不动产;再加上犹太人宗教习俗使犹太人在基督教社会从事务农的时间相对减少。所以,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从事农业的犹太人口极为稀少,大致占犹太从业人口的0.5%左右。在手工业方面,犹太人在刚开始进入欧洲时,许多人从事着手工业,如印染、丝织、刺绣、金银锻造以及玻璃制造,但到10世纪之后,随着欧洲城市的发展,各国纷纷建立了手工业行会,由于主流社会对异教徒犹太人的反感,行会对犹太人手工业有着严格的限制,于是“当欧洲基督教国家手工业行会制度普遍确立后,犹太人的各种手工业经营便被有效的阻止了”。犹太人长期被排挤出主流经济活动之外,他们为了生存,只能选择主流社会不愿从事的行业——商业和钱贷业。另外,犹太人在长期的流散过程中,长期保留着经商传统;犹太人定居的分散性及其城市化特点为经商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共同的宗教信仰和遭受迫害的命运,犹太人表现得十分团结,有利于形成统一的犹太人商业和信用网。历史表明,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犹太人与商业和金融业有着密切的关系。据统计:即使到近代早期,仍然大约有50%的犹太人从事商业和金融,20%的犹太人是小商贩。犹太人在从事这些职业的过程中,培养了较为丰富的经商经验,建立了犹太人的信用体系,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在近代,随着货币在经济领域作用的凸显,重商主义的兴起,一个国家的实力取决于它所拥有的货币财富量,而这种财富在当时主要通过贸易、信贷等手段获取。“到17、18世纪商业目标已成为欧洲统治者所关注的首要问题,宗教问题则降到次要地位”,因此政府把发展商业和金融放在重要位置。然而,在中世纪基督神学控制下的欧洲,人们对劳动和财富有着独特的认识,普遍认为商人及其从事的商业活动是低贱的,甚至是罪恶的。主流社会的许多人不愿意从事这些所谓的低贱的职业,从而导致经商人才在一定程度上的短缺。这种局面为犹太人发挥他们的特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许多犹太人抓住这个机会被宫廷委任为宫廷代理商、外交官、管理人员等重要职务,成为宫廷犹太人。

孙炳辉、郑演达:《德国史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阿巴·埃班:《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

潘光等:《以色列·犹太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页。

雅各布·马库斯:《德国犹太人的兴起和命运》(Jacob R. Marcus, *The Rise and Destiny of the German Jew*),美国希伯来联合学院1934年版,第103-109页。

罗伯特·M. 塞尔茨:《犹太的思想》,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53页。

潘光等:《以色列·犹太学研究》,第144-145页。

雅各布·马库斯:《德国犹太人的兴起和命运》,第125页。

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第三,犹太人对居住地表现出来的“忠诚”和“弱民”地位也是宫廷犹太人大量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从公元 70 年第二圣殿被毁,犹太人被赶出家园,从此他们的主体一直生活在以色列故土以外的地区,散居于世界各个民族之间。犹太人的这种客民身份,使得犹太学者不得不考虑犹太人与居住地关系的问题,早在萨珊王朝时期犹太教中就形成了“政府之法是律法”的思想。尽管这个思想有居住地世俗法律高于犹太教律法之嫌,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犹太律法的阐释和施行,但是也正是这个思想调和了犹太人与居住地的关系,遵守居住地的法律体现了犹太人对居住地统治者的忠诚。特别是在中世纪的欧洲,“犹太社团只有在取得特许状的情况下才能获得一定的居住权”,犹太人要想在这种情况下客居下来,必需要妥善地处理好与统治者的关系,希望用自己的“忠诚”来换取居住权和得到统治者的保护。所以在同统治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十分谨慎,坚守信誉,努力满足统治者的要求,有时甚至会放弃自己的一些利益。犹太人的这种“忠诚”,正好是 17、18 世纪急于扩充势力的德意志各个宫廷所急需的。尽管犹太人对统治者表现出无比的忠诚,但是由于处于“外来人的弱民”地位,统治者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他们作为替罪羊加以利用。在历史上,犹太人在不需要时被主流社会驱逐、迫害,在需要时被召回的这种现象在欧洲时常发生,而且无论统治者怎么处置犹太人,基本上都会得到当地人的支持,这也是利用犹太人的一大好处。所以刘易斯·科塞指出:“在社会转型时期,新兴的统治者想取得他们没有拥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这时可靠的权力的走卒就显得尤其重要……这种难得的忠诚在当地的普通群体中很难找到,因为他们同旧的统治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新兴的统治者往往利用侨民来为他们服务,扩大他们的权力,剥夺旧的统治者的权力,他们只好寻求外来人。”利用犹太人比使用其他人有这么多的好处,所以当时的宫廷非常乐意犹太人为他们服务。因此,在 17、18 世纪,德意志地区的一部分犹太人抓住这个机会,活跃于以宫廷为核心的主流社会。

二、犹太人在德意志宫廷的主要作用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宫廷犹太人作为犹太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产生和存在与宫廷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犹太人自成为宫廷犹太人之日起,便肩负着为宫廷服务的职责。综观 17、18 世纪德意志地区的宫廷犹太人,他们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了作用。

首先,犹太人为宫廷提供战争资金是他们在德意志地区的主要活动之一。近代欧洲爆发了一系列的战争,如三十年战争、七年战争、北方战争等。这些战争的胜负直接影响到参战各方政治地位的高低、地盘的大小、经济利益的多寡,甚至决定着一个邦国或王国的存亡。要想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必需要有足够的金钱来雇佣军队、购买军需等。历史表明,富有冒险精神的犹太人通过他们的经济活动在为战争提供资金方面发挥了非凡的作用,有时决定着战争的胜负。以哈布斯堡为例:在战争爆发时,哈布斯堡皇帝的财产几乎挥霍殆尽,不能够供给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作战士兵的军需,哈布斯堡的统治者面临着失败的威胁,不得不求助犹太人撒母耳·奥本海默。维也纳的奥本海默于是被委任为帝国军队的代理商,为军队提供贷款、服装、马匹、粮草、枪支等,并且帮助运送士兵。1683 年,遭受围困的维也纳因为他

罗伯特·M. 塞尔茨:《犹太的思想》,第 262 页。

张淑清:《论中世纪西欧犹太社团的司法自治》,《学海》2006 年第 1 期。

刘易斯·A. 科塞:《作为权力仆人的外乡人:宫廷犹太人和基督教叛教者》(Lewis A. Coser, *The Alien as a Servant of Power: Court Jews and Christian Renegade*),《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2 年第 5 期。

的援助而解围;德军在1686年围困布达佩斯和1688年占领贝尔格莱德战役中,奥本海默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帝国的军队指挥官伯爵刘易斯承认:“如果没有奥本海默的支持,战争不能够继续下去,德意志在各个方面都会以失败而告终。”1688年,普鲁士军队进攻巴列丁奈特,奥本海默利用犹太人的广泛的金融网,连续几年为这次战争的前线军队提供资金。奥本海默去世后,萨母森·威特海默继任为该地区的军需供应商。在同西班牙的战争中,威特海默支付了大量的军费。除了哈布斯堡家族以外,这个时期德意志地区几乎每个邦国都有几个犹太人为其宫廷服务,参与到他们的战争中去,在某种程度上欧洲战争孕育了德意志地区的宫廷犹太人,欧洲战争也离不开犹太人。有学者指出:“宫廷犹太人最突出最有政治影响的活动毫无疑问是为欧洲的战争提供资金。”

第二,宫廷犹太人不仅为战争提供资金,而且其经济活动还渗透到宫廷的其他政治生活方面。犹太人在与主流社会长期交往中,对政治非常敏感,因为居住国的任何政治上的风吹草动说不定都会对他们产生严重的影响;再加上犹太人在居住国的生存要得到当地统治者的许可和保护,对当地的政治势力有一定的依附性,所以犹太人对居住国的政治非常关注,经常参与他们认为有利的政治活动中去。在17、18世纪,宫廷犹太人把许多资金投入除战争之外的政治活动之中。在参与选侯、国王和君主的选举、继任方面,宫廷犹太人表现得十分积极,他们筹集大量的资金支持那些随着权势扩大而想提高地位的君主、选侯等。1649年萨克森的选侯奥古斯都二世(1670-1733年)通过贿赂波兰贵族,取得了波兰的王位。奥古斯都二世为此支付的上百万金币是由宫廷犹太人伯伦德·雷曼提供的,“如果没有他和其他犹太人的帮助,奥古斯都不可能成为波兰国王”。这位宫廷犹太人也因此成为德意志北部地区最耀眼的人物,借机拓展自己的经营领域并从事各种行业,有着宫廷银行家、军队代理商、宫廷珠宝商和政治代理人等多个名号。汉诺威伯爵艾伦斯特·奥古斯都的宫廷犹太人雷夫曼恩·贝伦斯献给帝国许多金钱,估计在110万金币,并帮助弗里德里克一世在1701年取得普鲁士国王的职位,他也因此取得了选举贵族的头衔。另外,还有一些犹太人由于他们的才能和贡献而被宫廷委任为各级官吏,在17、18世纪有许多犹太人成为宫廷的顾问、收税官、外交官员等。如:人们习惯上称呼苏斯·奥本海默为“犹太人苏斯”,他在政治上很有影响,曾经担任符腾堡的伯爵查理·亚历山大的顾问,帮助伯爵制定了许多政策,由于他在政治方面的影响而受到地方贵族的强烈抗议;1700年,鲁本·伊利亚格·姆佩尔兹被任命为克莱夫和马卡公国的大收税官;伯伦德·雷曼作为萨克森的奥古斯都·斯特朗的政治代表,参加了波兰国王的选举及其谈判。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时期虽然犹太人利用他们经济上的成就和影响,直接参与宫廷的一些政治活动,但是不能过高的估计他们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的一切言行必需听命于他们所依附的宫廷,为他们的主子服务,是他们经济活动的结果和延伸。经济和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相互影响,犹太人在宫廷的活动也不例外,不可能把二者完全剥离。即使宫廷犹太人最单纯的经济行为也包含着政治性的因素。

第三,犹太人的经济活动在宫廷的日常生活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商业贸易是犹太人从事的主要职业之一,在长期的流散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犹太人商业贸易网络,积累了一定的经商经验和资金,所以许多宫廷把其拥有的产业交给犹太人经营和管理。1672年,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克·威廉一世委任克勒菲的摩西·莱温·格姆佩尔兹家族在阿姆斯特丹为他出售经营珠宝,估计价值在22万金币左

F.L. 卡斯腾:《宫廷犹太人:解放的先驱》,第144页。

迈克尔·A. 迈耶:《德国现代犹太史》(Michael A. Meyer, *German Jewish History in Modern Time*)第1卷,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页。

迈克尔·A. 迈耶:《德国现代犹太史》第1卷,第108页。

右。1732 年,这个家族的雅各布·格姆佩尔兹用金钱为宫廷购买成年的身材高大的卫兵,价格分别是 60 英吋高 300 金币,73 英吋高 400 金币,74 英吋高 500 金币,75 英吋高 1000 金币,76 英吋高 2000 金币,这些卫兵被用来护卫宫廷。犹太人负责宫廷护卫士兵的购买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因为这件事关系到统治者的安危,如果宫廷对他们御用的犹太人没有足够的信任和信心绝不能把这件事情交给他们办理,由此可以看出部分宫廷犹太人与宫廷的亲密关系。同时,宫廷犹太人也出资为宫廷修建宫殿,购买生活必需品和奢侈用品,提供娱乐服务等。

三、宫廷犹太人与犹太社团的关系

宫廷犹太人在进入主流社会后是否割断了与犹太社团的联系呢?资料显示,这个时期的德意志宫廷犹太人虽然同以宫廷为代表的主流社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享有一定的特权,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忘记自己的犹太身份,始终与犹太社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犹太社团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宫廷犹太人既对宫廷有着特殊的贡献,又拥有同宫廷直接打交道的经验和技能,所以德意志地区的许多宫廷纷纷任命宫廷犹太人担任所在地犹太社团的领导人,便于他们对犹太人的利用和管理。在当时,犹太人必需得到居住地统治者的特许才能在该地居住,并接受主流社会的统治,他们一般被认为是统治者的私有财产,在 17、18 世纪,有许多宫廷犹太人被任命为犹太社团的官方领导来管理宫廷的这份特殊财产。1651 年,明斯特地区的主教任命一个富裕的宫廷犹太人为该地区所有犹太人的领导。这个宫廷犹太人的职责是:确保犹太社区保护税的收取,解决犹太人之间的争端,提议拉比的任命。稍后,克莱夫地区犹太人社区的领导也由宫廷犹太人古姆伯特·所罗门担任,在他之后,其家族成员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他们的职责是收取强加给犹太人的特别税。这些被任命为犹太社团领导的宫廷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有益于保护整个犹太社团利益,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忘记自己的犹太身份,巧妙地周旋于宫廷和犹太社团之间,为犹太社团争得了一定的利益。毕竟他们是宫廷任命的官员,不得不为宫廷的利益考虑,做些不利于犹太社团的事情在所难免。再加上他们的个人利益也与此息息相关,因为宫廷犹太人被宫廷允许通过收取犹太人的赋税来偿还宫廷的欠款。所以有时这些充当宫廷官员的犹太人在犹太社团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

尽管这样,从总体上看宫廷犹太人在犹太社团中仍然拥有很高的地位,他们的功能远远超出了宫廷任命他们的初衷。迈耶指出:“如果宫廷犹太人在犹太人社区的功能仅仅是收税,那么他们在犹太社区的地位还不如一个令人害怕的世俗社会的收税官或贵族。”宫廷犹太人通常是当地犹太社区的赞助人和集体利益的鼓吹者。他们把没有取得居住许可的犹太人接纳在自己家里作为仆人,使他们免受驱逐,确保他们能够生存下来;建立了许多慈善机构和基金,一些机构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无数次成功阻止了有计划的迫害犹太人,解放受害者,阻止暴力和反犹出版物的扩散。总之,无论哪里有贫困和危险威胁到犹太人,宫廷犹太人的帮助就要到达哪里。例如,哈尔伯斯塔特地区的伯伦德·雷曼是一个有影响的宫廷犹太人,为其他宫廷犹太人树立了榜样。他从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克一世和弗里德里克·威廉一世那里取得了保护犹太人的特殊条件。作为波兰国王的特使,他确保了利萨犹太社团的安宁。为了犹太人的相互利益,他与来自波兰的宫廷代理商和德国其他宫廷犹太人进行谈判,协调犹太人的行动,避免社团的分裂。虽然雷曼被宫廷生活和巴洛克生活方式所吸引,但是他基本上能够保持对犹太传统的信

仰。所以他把对犹太同胞施行慈善和对非犹太人的关心结合起来。他曾经为修建哈尔伯斯塔特的犹太人会堂进口大理石柱,在该市发生大火后,他又慷慨地帮助穷人修建房屋。再如,奥本海默的代理人来往于匈牙利、斯洛伐克和巴尔干等地赎回在土耳其战争中被俘的犹太人。正是由于宫廷犹太人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对犹太社团帮助,并得到了犹太人的认可,他们受到犹太同胞的尊敬,在希伯来文献中被尊称为“调解人”、“保护者”。

在犹太文化传承和发展方面,宫廷犹太人也积极参与,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塞法尔迪犹太人中存在着富裕的家庭在自己的家中留出专门房间为学者研究之用,并为学者提供生活开支的传统。到了近代这个传统传到德意志宫廷犹太人中间并被很好的保持和实施下去。许多宫廷犹太人为研习犹太历史和文化提供场所和经济支持。1689年宫廷犹太人格姆佩尔兹建立了一个叫作克劳森的建筑专供学者研究之用;同年,宫廷犹太人雷夫曼·伯伦斯在其家中也建立了一个供研究之用的场所,供研究《塔木德》的学者居住。他还出资赞助研究《塔木德》书籍的出版。1703年在哈尔伯斯塔特地区伯伦德·雷曼建了一座克劳斯(Klaus,原意是指东欧犹太人祈祷用的场所,这里指研究用的场所),供三个学者研究和居住,还为这所房子配套了图书馆和会堂。当他认识到孩子学习宗教经典的重要性时,曾向犹太社团当局呼吁在该地修建《塔木德》学校,并愿意为该犹太社团提供三分之一的财政,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就要离开此地,可见他对支持犹太教育,开展犹太研究的决心。这个时期,一部分宫廷犹太人大力修建研究场所、出版犹太文献、提供研究资助等措施吸引了很多外地的学者,鼓励他们继续从事犹太研究,为犹太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犹太启蒙运动之父摩西·门德尔松就是一个与宫廷犹太人有着密切关系并受到保护的犹太人,他为犹太文化的转换和发展起着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影响着德国犹太文化,而且整个近代犹太文化都深深地打上了门德尔松的烙印。

近代德意志地区许多犹太社团的起源和发展也与宫廷犹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现代早期德意志地区隔都制度盛行,犹太人被逐出大部分德意志城市……仅仅在法兰克福、沃姆斯、维也纳和布拉格存在一些重要的犹太社团”,在德意志许多地方不允许普通犹太人居住。由于宫廷犹太人对宫廷的贡献和工作的需要,他们享有居住隔都之外、自由移动、雇佣仆人等方面的特权,这些为新的犹太社团的出现和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宫廷的特许下,宫廷犹太人可以到一个没有犹太人居住的城市定居和开展业务,为了工作的方便,他们雇佣许多犹太仆人和工人。随着被雇佣的犹太人口的增加,这些有着共同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的犹太人走到了一起,成为新的犹太社团的核心成员,逐步形成新的犹太社团。近代德意志的许多犹太社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如马德格堡、柯尼斯堡、布莱斯劳等。

尽管宫廷犹太人与他们的社区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他们之间也经常发生摩擦和冲突。由于宫廷犹太人对宫廷的贡献以及对犹太社团的影响,他们不仅在主流社会享有一定的特权,而且在犹太社会也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在犹太人当中形成了一小批上层犹太人。迈耶指出:“宫廷犹太人存有专制主义的倾向,他们往往以统治贵族自居,一般来说犹太社团也是这样认为和对待他们的。”他们拥有的特权和利益有时把他们和普通的犹太人区别开来,甚至超越拉比司法权。他们还利用其身份和影响为其家

Shtadlan 来源于亚拉姆语,劝说之意(to persuade),主要指那些代表犹太人利益的犹太名人。

罗伯特·M. 塞尔茨:《犹太的思想》,第504页。

迈克尔·A. 迈耶:《德国现代犹太史》第1卷,第119页。

族服务,谋取大量的私人利益,控制社团行政和宗教事务。在当时犹太人自治机关卡黑拉中有许多官员都和宫廷犹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直接是受宫廷犹太人的影响而任命的。柏林的宫廷犹太人约斯特·利布曼恩及其继任者以斯帖成功地安排约斯特的弟弟任纽马克地区的大拉比;稍后他们又安排以斯帖的女婿继任这个置位。克里夫的宫廷犹太人鲁本·伊利亚格·姆佩尔兹被任命为西里西亚犹太社团的拉比;梅伦堡宫廷犹太人鲁本·迈克尔海·因里森的岳父被任命为梅伦堡地区的拉比。犹太社会盛行的富人和知识阶层相互通婚的习俗更加剧了这种情况。大多数犹太社团对宫廷犹太人的特权和裙带关系保持沉默,也有一些犹太社团不断起来反抗。哈尔伯斯塔特的犹太社团抗议任命亚伯拉罕·雷伯曼恩为拉比;雷伯曼恩在钱贷业和欠款方的裁决权不仅受到城市议会反对,而且也受到犹太社团成员的抗议,两年后雷伯曼恩被解除克莱夫地区的拉比职务。帕德博恩和克莱夫的犹太社团强烈反对伯伦德·利未,认为他残暴不良,不适合做社团的领导。

德意志的宫廷犹太人在某些方面是中世纪西班牙模式的再现,即一些犹太精英同统治者形成了密切的经济和私人交往。同时,德意志的宫廷犹太人也是一种现代的发展,他们能够充分利用重商主义政策和变化的环境,在西欧日益资本主义化的经济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并利用他们同大西洋沿岸各个港口以及波兰、立陶宛、地中海沿岸犹太商人的贸易关系,为他们的统治者效力,取得了非凡的业绩。宫廷犹太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犹太人群体活跃于以宫廷为代表的社会,为宫廷所用。他们取得了许多普通犹太人不具有的特权。他们的经济活动不再受到限制,享有和基督徒同等的权利,如不缴人头税和强加给犹太人的其他赋税;被允许在隔都之外居住,可以在公国内自由移动,携带武器;还取得了一般市民不曾享有的权利,如在特殊的时候可以直接面见君主,有时可以垄断着某些行业的经营权。从本质上看,宫廷是出于有利于犹太人更好地为他们服务的目的才给犹太人一些特权和便利,并不是有意要解放犹太人,宫廷犹太人并没有成为当地真正的市民,完全取得公民权,但是这些宫廷犹太人在主流社会的成功,地位的改善,走出隔都,更多地了解主流文化,客观上对犹太人的解放和发展准备了条件,后来许多宫廷犹太人成为犹太启蒙运动和犹太人解放的开路先锋。

从德意志地区来看,宫廷犹太人无论对非犹太社会还是对犹太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是德意志地区专制主义的代理人,是君权和地方贵族斗争的工具,在德意志地区的军事斗争、政治活动和经济生活中都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对整个欧洲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来讲,犹太人的影响只是局限在一定的地区和领域,不要过高的估计宫廷犹太人在整个经济和政治中的影响。虽然犹太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在欧洲殖民扩张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并没有起着核心作用。宫廷犹太人在德意志地区产生的影响是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许多宫廷犹太人在德意志地区的成就和地位是昙花一现。在 19 世纪,随着基督教徒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繁盛,犹太人与宫廷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一些宫廷犹太人逐步走向没落。

[本文作者张礼刚,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博士生。开封 475001]
(责任编辑:马新民)

亚伯拉罕科恩:《大众塔木德》,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6 - 208 页。

伯纳德·马丁:《犹太教史:欧洲和新世界》(Bernard Martin, *A History of Judaism: Europe and the New World*)第 2 卷,基础读物出版公司 1974 年版,第 210 - 230 页。

SUMMARIES OF ARTICLES

Intercourse between the Jews and the Arabs in the Islamic World

Zhang Qianhong

Historically, the Jews and the Arabs were related by blood, being racially close relatives and geographically neighbors. In remote antiquity, they maintained close ties with each other and entered into friendly alliance by marriage with one another. Afte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Temple, the Jews who scattering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brought along with them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Jewish culture, which exercise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Islamic theology. After the 7th century, the tough policy of Islam towards anti-Islam forces alienated the Jews, and led to religious conflicts. When the rule of Islam was smooth and steady, they lived in harmony. The rise of the Abbasids saw a concomita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Jews attached as political and even as military advisers, who made a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bbasids. It was under Arabian tutelage and with grudging Arabian condescension that the Jewish communities in Spain and other places witnessed a florescence in all areas of creative activities and attained the heights of cultural expression.

A Research of the Persecution of the Vichy Government on the Jews

Zhang Qin Hai

Vichy government was the accessory of Nazi to massacre the Jews who lived in France. Firstly, Vichy government slandered the Jews, and promulgated a lot of laws and degrees; secondly, it set up 15 Internment camps to control the Jews; thirdly, it help Nazi roundup about 75,000 Jews. With the help of the common people, the Jews in France were relatively less subject to deportation than those in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A Study of the Jews in German Court (1600 - 1700)

Zhang Ligang

From 1600 to 1700,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in Europe, especially Germany, was accompanied by the court Jews, due to their unique experiences, their loyalties to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ir weaker status. They were confided by local court and granted better position than other Jews because they made use of their effects on economy to take part in military affairs, political actives and daily life. Though they conflicted with the Jewish communities sometimes, they held their identities, and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e administrating their Jewish communities, establishing the new Jewish communities, developing the Jewish culture. Meanwhile, their activities created conditions for the Haskalah and the Jewish Emancipation.